

王夫之詩學思想論稿

崔海峰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夫之詩學思想論稿

崔海峰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夫之诗学思想论稿 / 崔海峰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37 - 2

I. ①王… II. ①崔… III. ①王夫之(1619 ~ 1692)
—诗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9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25)
第一节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命题的提出	(26)
第二节 何谓“内极才情”	(31)
第三节 何谓“外周物理”	(39)
第四节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途径	(45)
第二章 文质论	(52)
第一节 文与质的基本含义	(52)
第二节 文、章和文章	(58)
第三节 文与质的关系	(67)
第三章 宾主说	(73)
第一节 宾主说的提出	(73)
第二节 宾主说的理论渊源	(76)
第三节 宾主说的基本内涵	(80)
第四章 意境论	(86)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86)
第二节 情景交融	(88)
第三节 超以象外	(91)

第四节 意境的灵动之美	(95)
第五节 意境的哲学意味	(98)
第六节 意境的最高成就:大音希声	(101)
第五章 双行说	(105)
第一节 庄子的两行说	(105)
第二节 王夫之对庄子两行说的解释和接受	(106)
第三节 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112)
第六章 兴会说	(123)
第一节 兴会的基本含义	(124)
第二节 兴会的基本特征	(128)
第三节 兴会说的理论阐释:现量	(133)
第四节 兴会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135)
第七章 天才论	(137)
第一节 天才的含义	(137)
第二节 天才的基本特征	(142)
第八章 文体论	(153)
第一节 体裁的规范	(153)
第二节 诗体的创造	(160)
第三节 风格的追求	(168)
第九章 艳诗论	(174)
第一节 艳情与淫情	(174)
第二节 艳诗中的宫体诗	(178)
第三节 艳诗与亡国之音	(180)
第四节 艳诗佳作的衡量标准	(185)

第十章 兴观群怨说	(189)
第一节 诗可以兴	(191)
第二节 诗可以观	(193)
第三节 诗可以群	(195)
第四节 诗可以怨	(196)
第五节 随所“以”而皆“可”	(201)
第六节 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	(204)
 第十一章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208)
第一节 “温柔敦厚”的提出	(208)
第二节 “温柔敦厚”的思想渊源	(210)
第三节 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	(213)
第四节 别开生面——王夫之的诗教观	(215)
 第十二章 以诗解诗论	(222)
第一节 “以诗解诗”的针对性	(222)
第二节 “以诗解诗”的思想渊源	(225)
第三节 “以诗解诗”的诗学意义	(229)
 余论	(234)
 附录	(299)
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王夫之诗学研究	(299)
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王夫之诗学研究	(308)
 主要参考文献	(322)
初版后记	(326)
新版后记	(328)

引 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后人称“船山先生”。他出生于湘南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曾祖、祖父和父亲都专心于学，守身持重。他从小聪颖过人，博闻强记，7岁时已随长兄介之读完“十三经”，14岁就考中秀才，24岁考中举人，后因战乱未能进京参加全国会试。他在经义和诗文等方面的丰厚学养，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夫之生逢乱世，胸怀忠贞报国之志。明朝末年，政治严重腐败，皇室、宦官、酷吏、豪绅疯狂掠夺社会财富，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自1627年起，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有星火燎原，所向披靡之势。面对天灾人祸，王夫之忧虑不已，他一方面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拒绝与农民军为伍。他在1638年与友人结“匡社”，立志匡扶社稷，把挽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朝廷身上。

1644年3月，李自成军攻破京城，崇祯皇帝鸣钟集百官商议，无一人到朝，乃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同年5月，清军进占北京，9月迁都，定北京为清朝首都。闻此变故，王夫之无比震惊，痛苦不堪，作《悲愤诗》一百韵。如其子王啟所说：甲申五月，闻北都之变，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后四续其韵（王啟《大行府君行述》）。

1646年11月，明桂王于肇庆即皇帝位，建立了持续16年的南明永历政权。这时王夫之栖身南岳草舍，在友人的关照下修建“续梦

庵”，身虽处于山间一隅，心中的抗清意识却日益坚定，浓重。他兼有学人之知与义士之行。在他所处的两湖地区，抗清的局势变数很大。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后，两支余部先后进入湖南，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但却不受信任，被安排分散驻扎，其抗清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另外，湖广总督与巡抚各自拥兵自重，明争暗斗，不能通力合作，在征集粮饷和安置农民军等方面疏漏百出。王夫之担心这种情况会导致败局，此时，他在武昌中举时的一位考官章旷正好担任湖北巡抚，监司军务至湘阴，于是他赶赴湘阴，希望章能调和屯兵于湖南、湖北的首领间的矛盾，以防溃变。章却说其间本无异同，不必过虑。王夫之听后，只能默然而退。他所担心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此番义举，在王敬的《大行府君行述》和潘宗洛的《船山先生传》中均有记载。

南明政权建立不过数月，清军即下广州，占肇庆，永历帝避退梧州、桂林、全州、武冈。王夫之曾与友人奔赴武冈，但因连日大雨，道路不通，困于湘乡县西南的车架山，未能如愿。这时，清军已攻占衡州，王夫之隐居于湘乡白石峰。这段时期，家中接连遭遇不幸，王夫之奔波于家与避难处之间。1648年，一些降清明将陆续举兵反正，永历帝得以还都肇庆，湖南的大部分失地在数月内得以收复。为配合南明大军的反攻，王夫之与几位友人发动了衡山抗清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奔赴肇庆南明朝廷，但在朝廷“所见犹为可忧”，因而一再迟回故乡，回乡之后也“情终系主”。第二年他重返朝廷，经名臣瞿式耜推荐任行人司行人。此时朝廷的党争激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王夫之数次冒死上疏，指斥王化澄等人结党误国。^①幸亏忠贞营主帅高必正（高本名高一功，原为李自成部将，忠贞营由高和李锦率领的农民义军改编而成）等人出面营救，王夫之才免遭迫害。他后来在《章灵赋》自注中写道：虽陈力之无可致其靖共，而悲愤有怀，不能自匿，故有死净之事。

^① 关于此事，王夫之曾无奈地说：“既三谏不听，谏道穷矣。乃以病乞身，遂离行阙，而心念此去终天无见吾君之日，离魂不续，自此始也。”（《章灵赋》自注，见《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87页。）

1650年8月，王夫之在桂林与瞿式耜（同年11月，清军攻入桂林，王化澄等迎降，瞿被俘后坚贞不屈而遇害）聚会。不久，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书，却在返乡途中遭遇连月淫雨，^①等他次年终于到家时，老母早已于数月前去世。这边未及与老母见上最后一面，那边恐怕再无见君主之日（“心念此去终天无见吾君之日”）。祸不单行，忠孝难以两全，一般人如何承受得住？这一时期，抗清局势又出现反复。全州、桂林和梧州等地先后被清军攻破，永历政权随着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而朝不保夕。经联络，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大西军（张献忠的余部）投明抗清。心术不正的孙可望要求南明封他为王，刺杀了十多个反对者。永历帝遂封孙可望为秦王，迁至贵州，苟且偷安。大西军与南明联合后，于1652年3月出师北伐，年内即攻破南方数省。黄宗羲曾说：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以来所未有也（《永历纪年》）。的确，这是明末抗清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王夫之听说永历帝到达贵州安隆与大西军会合之后，曾打算奔赴行在，但犹豫彷徨，只得卜之于《易》。他深知永历帝介于存亡之间，而自己“爱主之心，尤不能忘”，此可谓心向往之。但却又去不得，如他所说：“……欲往就之，奸雄窒路，如天难登，如之何其弗怨也！”（《章灵赋》注）他对孙可望的恶劣行径和野心有明确的认识：“时上受孙可望之迎，实为所挟，即拂君臣之大义，首辅山阴严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封，为可望贼杀。君见挟，相受害，此岂可托足者哉！”（同上）他对李定国的认同表明对农民义军并非全无信任，造成他内心困惑的最大因素就是孙可望，他说：“可望别部大帅李定国，出粤楚，屡有克捷，兵威震耳。当斯时也，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同上）“唯余一意事主，不随众狂，而孤立无援，如彼何也。群奸畏死贪赂，复阴戴孙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同

^① 1650年冬，王夫之作《桂山哀雨》四诗，他在题序中说：“其时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绝食者四日，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顾自桂城溃陷，淫雨六十日，不能取道，已旦夕作同死计矣。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续哀雨诗四首》）

上)他意识到君子之不幸莫过于“留则山河非有,往则逆顺无垠”,但在“往径既绝,来踪未卜”,“人不可谋,天不可问”的孤愤境况中,他仍坚贞而无怨地怀有思君之心、求仁之志。

正如王夫之所预料的那样,孙可望无济于抗清大业,他在1653年初因嫉恨而欲杀害李定国,使后者为避冲突而率兵退出湖南,湖南又失于清军。孙可望由挟主到反主,于1657年叛明降清。从1654年起,为躲避清军,王夫之隐姓埋名,流浪于湘南各地,期间曾为问学者讲授《春秋》和《周易》等,写了不少抒怀忆旧的诗文。在经受了三年的流浪之苦后,王夫之于1657年带着妻儿回到衡阳,仍住在莲花峰下的续梦庵旧居。1660年迁居衡阳金兰乡,造一间茅舍名为“败叶庐”。这期间他在生活中又遭遇一些不幸的变故,1662年4月,吴三桂在昆明绞杀永历帝,南明永历政权至此覆灭。王夫之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续《悲愤诗》一百韵,此后他真正成为亡国遗民了,但反清复明的梦想并未完全破灭。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7年后彻底失败。而在1674—1678年间,王夫之一反此前蛰居乡里十余年的常态,外出活动十余次,他所到的城市都是被吴三桂攻克或是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可见,他虽不追随吴三桂,但却赞赏反清复明的活动。1678年后的十余年,他一直居住在湘西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足迹不出乡里。

1685年,王夫之在《病起连雨》诗中写道:“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故国不堪回首,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应发扬光大。他以此为己任,潜心学术研究,“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到了晚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他曾自题楹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观生居”旧题壁)他自题小像《鹧鸪天》中有“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之句。在他看来,本应为国捐躯,却未遇适当机缘,不能因为“遁迹深山,不为降吏”就可置身于“贞夫”之列,他的神魂已随先君故国而去,如今苟活人间无异于“活埋”。

1691年以后,王夫之久病喘咳而吟诵不辍,他的绝笔诗为:“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

间一字无。”他自志其墓曰：“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碑铭大意为：我虽孤愤不平、忠义激烈如东晋刘琨，但却不能像他那样孤军奋战，以死报国；我有志弘扬北宋张载的正宗学说，却力所不能及。1692年初，王夫之病逝，完发而终，葬于衡阳金兰乡。

有学者说，王夫之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求学取功名、抵抗清军和退隐著书三个阶段，其中又以第三阶段的时间最为长久（从33岁至去世）。^①也有学者认为，王夫之的全部经历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651年以前的早期生活，主要是求学、抗清、追随南明朝廷；1651年以后的晚期生活主要是避祸、研究、著述。^②后一种看法所说的“早期”包括了前一种看法所说的求学取功名、抵抗清军两个阶段，所以，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相对而言，王夫之24岁（1642）考取举人之前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他的文学修养和学术功底主要得自于这一时期，但若论文坛影响和仕途功名，却也不算得志。稍长于他的吴伟业（1609—1672）23岁（1631年，明崇祯四年）考中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稍晚于他的王士禛（1634—1711）明亡时不谙世事，没有多少亡国仇民族恨，25岁（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时考中进士，后官至刑部尚书。

明清易代，对王夫之来说无异于天翻地覆^③，本着忠义激烈的性情，他不与清朝合作，亲自参与到反清复明的活动中去，但作为一介书生，虽心明眼亮，向人谏言却不被采纳，发动起义却不得成功，追随南明朝廷却难遇明君忠臣良将，于内外交困中流离失所。他自志其

①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② 参见张怀承《王夫之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③ 王夫之说：“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师，思庙（按：指崇祯皇帝）自靖。五行汨灾，横流滔天，祸婴君上，背天无兴勤王之师者。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章灵赋》自注）明清易代对王夫之的打击远甚于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在山中避乱的岁月里，他满怀忠贞报国之心而又难有作为，时常深感愧疚。因接受庄子的“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指是非两可而无矛盾阻碍，对客观的是非两皆顺之），内心有所宽慰。但亡国之痛沉重，至死未能释怀。

墓曰“明遗臣行人”表明他很看重这一名分，但他任行人司行人一职不过数月，曾三次上疏而不被采纳，险些被佞臣奸党置于死地。总的来说，他抗清的实绩不大，但却可歌可泣，他始终如一的忠贞报国的气节性情和精神可与历代仁人志士相媲美。

从1644年算起，王夫之大半生处于清朝，而从主观的立场、心态和精神上说，他始终是明代人。他在明末处于青少年时代而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3）建立诗学思想体系^①，如何把握社会变迁对他的诗学观念的影响，是诗学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本书无意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王夫之淡化了儒家诗教中的政治教化因素，强化了审美诗学的艺术精神，他的政治立场与诗学观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对诗中血性真情的推崇和对悲壮风格的偏爱等方面可以看出时代境遇对他的影响。

二

王夫之有很深的诗学修养。他自己曾说：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他在25岁时曾把自己的诗编刻一集，此后无论处境如何，都不曾中断诗歌创作，直到去世前写出绝笔诗为止。在他留下的大量诗文作品中，仅诗词就有约两千首。由于种种原因，王夫之在明清时期的诗坛没有产生影响。20世纪以来，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广为传播，他被尊称为文学家、思想家等。人们有机会读到他的诗，可是，他的诗仍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对其人其诗只字不提。我们不能说他的诗在多大程度上被埋没了，只能说他的鉴赏力远远高于创造力，他的鉴赏力足以使他成为一流的诗学评论家、美学家。

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主要有《夕堂永日绪论》、《诗译》、《诗广传》、《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

^① 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邹国平、王镇远认为，王夫之评选古代诗歌寓有如人所说“祖国沦亡”的民族感情的寄托，但他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首先并主要是开展诗歌艺术批评的著作，而不是几部表达政治寄托、思虑的书（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62页）。

此外，他撰有《李诗评》、《杜诗评》等诗学著作，均已散佚。至于他是否撰有《宋诗评选》，学界尚无定论，其子王昉的《大行府君行述》（手抄本）不曾提到这部据传已佚的著作，而王昉的学生曾载阳、曾载述在湘西草堂初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面的附识中说王夫之选评过宋元诗一帙。

现存的王夫之诗学著作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诗学、美学思想，至今远未被发掘出来。如果把王夫之和黑格尔相提并论，称他们各自的理论分别代表了中西古典诗学和美学的最高水平，绝非过誉。^①与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王夫之诗学在清代缺乏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下我们仅从王夫之的学术著作及思想在清代的传播这一角度加以简要解释。

1651年后，王夫之除因避难、访友和观察局势去过湖南一些地方（只离开湖南到江西萍乡一次）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湖南衡阳的家乡隐居，仅在金兰乡“败叶庐”和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就各住十余年。他潜心于学术研究，从理论上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竭力弘扬中华文化和诗学精神。王昉说他从辛卯（1651）至辛未（1691）四十年矢志不渝，用力不懈，其著述“诸种卷帙繁重，一一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大行府君行述》）。

王夫之的著述卷帙浩繁，在散佚颇多的情况下，现仍存95种，380余卷，约800万字。其中，哲学著作主要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等。史学著作主要有《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通鉴论》、《宋论》、《黄书》等。他的诗学著作均写于晚年，《诗广传》于1683年定稿，《楚辞通释》于1685年写成，《夕堂永日绪论》于1690年写成，《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诗文评类著作大致完成于1690年以前的几年。在王夫之生前，除一本自刻的诗集外，所有著作都不曾刊刻问世。因此，他的诗学思想不为世人所知，对当时诗坛没有产生影响。

^① 参见陶水平《船山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王夫之去世后百余年，其学术思想仍湮没不彰。乾隆年间，浙东史学家全祖望广泛搜集明末遗老事迹，汲汲为之表彰，但他对王夫之几乎一无所知。嘉庆年间，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评述了清代90余位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学术思想，其中竟无只字论及王夫之。

清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标榜文治，通过开设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等途径，笼络汉族文人；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着力钳制一切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而在王夫之的大量著作，尤其是《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永历实录》等史部著作和《悲愤诗》、《续悲愤诗》、《章灵赋》等集部著作中，反清复明的思想溢于言表，诸如“夷狄”、“丑夷”、“逆夷”等诋满文字触目可见。用当代学者邓乐群的话说，正是因为清政府的文网峻严和船山著作的抵触良深，才造成王夫之学术著作及思想长期湮没不彰的局面。

晚清学者邓显鹤曾将王夫之学术思想湮没不彰的原因归结为王夫之本人的坚贞自埋和门人故旧的无力推挽，这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王夫之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炎武、黄宗羲两先生，“先生窅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飴茶，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为之推挽，歿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邓刻船山著述目录》）。

后来梁启超在论及湖南之学风沿革时，提出与邓先生一致的看法：王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沈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然处偏僻之地，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之者，是以其学不传（《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一）。梁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畸儒”指称王夫之：“他生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所以连门生也没有。”这段话不够确切，王夫之还去过桂林、梧州、萍乡等地，他与方以智是好友，罗正钧《船山诗友记》云与船山友谊者百五十有六人。王夫之虽未开门办学，但并非没有门生，东南章有谟作为门生跟随他多年。1657年他隐居家乡后，陆续招收弟子十余人。但大约受他影响，他一生所授之弟子皆近于隐

士型人物，没有一人显赫于世以光大师门。

就处世的一般态度和状况而言，上面所引梁先生的话大致是不错的。王夫之年轻时曾参与“行社”、“匡社”的事务，这本与时尚相合，但他后来对此作过反省：“崇祯初，文士类以文社相标榜，夫之兄弟亦稍与声气中人往还，先君知之，辄蹙眉而不欢者经日。……大约窥先君之志，以不求异于人为高，以不屑浮名为荣。”（《家世节录》）在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他不趋附门庭宗派，不标新立异，赞赏“好驴马不逐队行”的俗语。据王敬的学生说：先生卷帙繁重，难于问世，且问世亦非先生意也，先生尝言“世之言诗文者，各立门户以争名场，吾名心消尽，所评论者借以永日而已”。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何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为世人所知。就连王夫之的家乡在当时都不传其学。^①

如今，一提“妙悟说”、“性灵说”、“童心说”、“格调说”、“神韵说”和“境界说”等，学过美学、文学的人大都知其创始人，而一提王夫之，能说出其诗学之大概的人却不多。个中原因，上面有所论及。

1705年，与王敬相知的潘宗洛在《船山先生传》中说：余所得见于王敬者，《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而已。当时王敬解释说：“先人家贫，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其门人，书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无几焉。”（《船山先生传》）这与王敬在《大行府君行述》中的说法是一致的，既不违背王夫之著述的大体情况，又是审时度势、巧妙应付的遁辞。王敬在《湘西草堂记》中说：迄壬申而先子奄背，敬仅固遗书于屋右阁，而火灾蚁蚀之害，其震惊怵惕不一次者也……迄敬年六十，从游者数十人……从游之士及姻友之有力者，续捐资刊先子遗书数种，藏版于右阁。王敬先后刊行了王夫之的十多种遗书，其中包括《夕堂永日绪论》，印数和发行范围不大。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敬等人的小心谨慎是完全必要的。据刘人熙记载：乾隆时，吕留良文字之狱波及船山，以兵围搜，幸取去《稗疏》数种

^① 王敬说王夫之晚年居于湘西蒸左之石船山，“蒸湘人士莫传其学，间有就而问字者，称为船山先生。……人士之赠答者，又称夕堂先生焉”（《大行府君行述》）。

无忌讳之辞，入之四库，余匿而免。由此可以理解王夫之的后裔何以不敢将遗书轻易示人。考《四库全书》总目和《清代禁毁书目》，清政府共搜罗到王夫之的15种著作，其中列入《四库全书》经部的仅6种（另附目3种），而列入禁毁书目的却有9种，这9种全是集部之书，是王敌自以为比较妥当才加以公示的，却仍被禁毁。

1840年，在邓显鹤（湖南新化人，人称“湘皋先生”）主持下，船山遗书首次系统校刻于湘潭，刊成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定名为《船山遗书》。此后几年，又陆续有人校刻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老子衍》和《庄子解》等七种著作。邓刻《船山遗书》功不可没，但因种类单调（仅限于经部之书，不包括诗学等方面的著作），卷帙有限，加上印行不多，故流传不广。

1865年，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主持下，船山遗书复刻完成。曾刻《船山遗书》远较邓刻本系统和完整，在经部之外，又增刻了史、子、集三部之书。全书共54种，计288卷。王夫之的主要著作大多已纳入此书，但《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诗学著作未被刊刻。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自此“大倡于湖湘而遍于天下”。长期沉寂的湘学界，一度因研究船山学说而空前活跃起来，著名学者有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刘人熙和谭嗣同等人。谭嗣同对王夫之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和民族民主思想给维新派的变法理论注入了有益的因素。他的“攘夷”思想、光复思想、民族独立自强思想给清末民主革命派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他的民族气节和斗争意志亦给予革命派人士以良好的影响。章士钊在1903年曾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章氏又说：果也！辛亥革命之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在清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而其文学、诗学等方面的造诣，却未引起广泛关注。

王夫之的古近体诗评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诸作，于其所有著述中刊行最迟，版本最少，书亦最残，其出版时间为1917年（民国6年），版权页注明校印者为湖南官书报局。

1933年（民国22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船山遗书》，收入上述著作重印。但这三种著作在问世后的大约半个世纪里仍未引起学界的重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于1934年问世，下册于1947年问世）说王夫之论诗之著作有《诗译》与《夕堂永日绪论》二种（丁福保即据以辑入《清诗话》，合称为《姜斋诗话》）。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说王夫之“有诗译一卷、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一卷、外篇一卷，其尚论诗文者见于此。或合诗译及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为姜斋诗话”。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据以研究王夫之诗学的文本局限于《姜斋诗话》，这虽然不失王夫之诗学精神之大概，却不利于把握王夫之诗学的真面貌。可见，王夫之的诗学著作在清代以后才全部问世（散佚的除外），对王夫之诗学的研究在清代以后才真正开始。

三

前面说过，王夫之晚年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愿和使命感。在他去世前两年，刘献廷南游衡岳，对他作出高度评价：“王而农先生……隐居山中，未尝入城市，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广阳杂记》卷二）1916年（民国5年），刘人熙为王夫之的《四书训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作序，其中有两段话如下：

其为学，旁搜远绍，浩瀚闳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学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四书训义序》）

“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哉其开生面也。……昔先师孔子反鲁正乐，古诗三千余篇，删存三百篇，天道备，人事浹，遂立千古诗教之极。而兴观群怨一章，即孔子删诗之自序，是孔子开诗之生面也。船山《诗广传》又从齐、鲁三家之外开生面焉。又评选